



艰辛与坚韧

杜光辉

20 世纪 70 年代末,我从铁路中专毕业,被分配到大巴山腹地的万源火车站。

我在一位工长带领下,从西安坐火车到安康。然后换上铁道兵的火车,向万源进发。行程漫长,头顶挂着一盏马灯,马灯摇曳,星光忽闪,心里有事,无法入眠,就取出书看。摇曳的灯光晃荡着书里的文字: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我初中还未毕业就从军,当了 6 年兵,复员后又读了 3 年中专,年龄二十三、四,爱情还没有光顾。白天做爱情梦,渴望天降姑娘,让爱有个寄托,给焦渴一条通道。看这样的故事,读这样的文字,岂能不心潮澎湃?禁不住念念有声,长吁短叹。

工长见我读古书流眼泪,问看的啥书,整得这么激动?

路途迢迢,知音难觅。把他看作知音,讲得口水直流。

李明堂警惕地朝四周瞅视,说到了单位,还是少看这些书。后半夜,火车在万源车站停下,工长忽地站起,对我们喊叫了,都下车,不要忘了行李!同学们被喊声惊醒,或者根本就没有睡着,揉着惺忪的眼睛,浑浑噩噩地扛起行李,走出马灯飘摇的老式客车,在站台上集合。

工长走到我跟前,拿过我手里的书,翻了一下书皮,我在火车上给你说的那些话,白说了!我赶忙收起书,连着他鞠躬,说我一直记着哩,刚才没带情干,随便翻翻。他见我态度好,没有过多追究。

我们电务部门是铁路上最清闲的单位,上班把设备检查一遍,就无事可做。几里以外是万源县城,县城不大,楼高不过三层,人口不过万八。襄渝铁路的员工,一部分是老线调来的,一部分是我们这些中专毕业生,还有一部分是下乡知青。最大的特点是男多女少,女工大多在城市找了对象,有主了。我们这些中专毕业生,正当恋爱结婚的年龄,却没有恋爱对象,斜靠着柜台,看女售货员,有一句没一句地和人搭讪,想当万源县的女婿。万源这地方山清水秀,滋养的女娃都细皮嫩肉,小巧玲珑,走路说话像莺歌燕舞。要细皮嫩肉,个个食店,炒上两个菜,要是一瓶高粱白酒,吃个肚子饱胀,喝个东倒西歪。我常常在醉中思考,就这样在大巴山混自己的一生?

一日,又在万源县城闲逛,不觉得走到万源县文化馆门口。从一个破旧的拱形门进去,看到一个招牌,好像当年红军某个遗址。文化馆有很小的图书馆,里面藏书,外间阅读,藏书不过数百,杂志不过数十。我眼前一亮,没想到这个穷乡僻壤,还有一个读书的好去处。一位 40 多岁的女管理员,我走进去,给她点头,她给我点头,算是互相礼貌。在仅有的一个阅览架上,拿起一本《新体育》,里面有位叫张洁作家写的《含羞草》。讲的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乒乓球运动员,自己完全可以冲击世界冠军,为了培养下一代,担任陪练。乒乓球运动员的姐姐,爱上这个语言,她们之间还发生了爱情。故事非常美好,情节非常精彩;世上还有这么好人,还有这么纯真的爱情;这么优美的文字,如此打动人心。我把这篇小说看完,像在久旱的沙漠喝到绿茶,巴颜喀喇山的严寒围着火炉,连年饥饿遇到美味鸡汤,心灵得到极大抚慰,精神充满朝气和生机,霍然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张洁可以写出如此美好的文字,我为啥不能写出如此美好的文字?

我决定开始文学创作。

在本该读书的年龄,参军入伍,驾驶军车奔驰在青藏高原,没有机会读书,没有构建出知识平台。像我这样几乎属于半文盲的铁路青工,要当作家,无异于搬个梯子,向世人宣布我要攀登月球,给嫦娥献花。

我知道,首先要拚命地读书,把自己的知识平台构建起来,然后才能写作。

我一个月的工资 43.37 元,必须拿出十多块钱买书。那时书便宜,两块钱可以买本很厚的书,10 多块钱可以买五六本书。但是,那时候的工资真低,买过饭票之后,剩下的钱买不了几本书。

我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读书,恶补过去没有读书的缺憾。

铁道部规定我们这批中专生,一律按工人对待,可以从中选拔优秀分子补充到干部队伍。同学们都想补充到干部队伍,就得靠拢能让你补充到干部队伍的领导。于是,领导家要打蜂窝煤。立即有人抢着去给人家打。我也想去,但正在看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剩下不多,看完再去给领导打蜂窝煤。看这类书不痛不痒,没有阅读激情,味同嚼蜡。但它描写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可以给我的历史知识进行一次扫盲,必须坚持读下去。看着,看着,就钻进去,钻进思想,忘乎一切。到了傍晚,太阳落山了,书看完了,猛然想起还没有给领导打蜂窝煤。急忙合上书本,拔腿就朝外跑,领导的蜂窝煤已经打完,自然失去了提拔结论的绝好机会。看完《中国通史简编》,我得出结论,好书不一定好读,尤其一些历史、思想、哲学类的书,必须攻读研读,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毅力。

读书人常犯懒,还试验着写些散文小说类的作品。常常折腾到后半夜,早晨起床,两眼红肿,像糜烂的桃子。睡眠不足,走路两腿打晃,如同神游。领导见我这么折腾,老远就指着我说批评,你晚上干什么去了,没有一点精神?我回答看书啦,看到天快亮才睡觉!领导又批评,青年应该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看看你这整天萎靡不振,像个青年人?

领导跑到我宿舍,检查我的书籍。领导把《世界通史》《中国通史》《马恩列斯全集》《毛泽

东选集》集中在一边,说这些书是好书,我们鼓励你多读,走得越多越好。领导要把那一堆文学书籍搬走。为了买这些书,我几个月不敢吃肉菜。领导要搬走这些书,无疑要割身上的肉。我的犟脾气上来,指着领导吼,你今天敢没收我的书,就跟你没完,到时候你别说我跟你过不去!

领导没敢搬走我的书,但跟我结下了梁子。得罪了领导,比脚小的鞋迟早要穿到你脚上。又仔细一想,一不偷,二不抢,不贪公家的钱,他们能把我怎样?也没把这事放在心上。毕竟收入有限,靠自己买书,读不了几本。一到周末,带上两个馒头,跑到万源县文化馆,读书。时间久了,管图书阿姨认识我,对我格外照顾。中午下班,把钥匙交给我,让我在里面看书,她还从家里带来暖水瓶,带来茶叶,供我解渴。几年里,我把图书馆的藏书和杂志,几乎通读一遍。我这才认识到阅读产生知识,知识产生思想。知识的平台越宽广,思想的深度越厚实。

新华书店经理告诉我,他们进了两套《沈从文全集》,还没有上架。如果我想看,给我留一套。我立即表示,请给留一套。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的书一直不得出版,能得到沈从文的书,真是意外的惊喜。拿到这套书后,我连夜拜读,看完他的中篇小说《边城》,产生了极大的迷惑。觉得这是一部充盈湘西乡土气息作品,被清丽的文笔吸引,被撑船老人与孙女翠翠相依为命的纯朴生活以及翠翠与船总两个儿子的爱情感动。仿佛走进田园诗般的边城世界,深受淳朴自然、真挚善良的人性美和人情美感染。向往他们诚实勇敢、乐善好施、热情豪爽、轻利重义、守信自约、人生追求。这种诗意地生活,诗意地栖居,深远自然、清灵纯朴、和谐隽永。我又为《边城》这样的小说惊讶,这是一部宣扬什么思想的小说?对于一直阅读《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这类红色经典的我,真是难以理解。

单位有一批高 66 级的下乡知青,我把《沈从文全集》借给他们,让他们看。而后把他们请到小会议室里,请讲读后的感想。他们说沈从文描写的那个湘西真好,没有阶级,没有尔虞我诈,人人与人之间纯朴自然,和谐相处,多么令人向往呀!

我们这代人,从小就在阶级斗争的漩涡里挣扎,从小在狼群里生存,喝着狼奶长大。沈从文描写的湘西世界,我们做梦都想象不出,还有这么美好的生活!我也感慨地说,我们要是能过上那样的生活,多好!

领导又找我谈话了,听说你组织人讨论沈从文的作品?我说读了沈从文的书,很多问题搞不明白,请教高一级的毕业生!领导说我找了沈从文的书,批判地看了。沈从文宣扬的观点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延续——我说要是沈从文的书有问题,国家为啥还要出版?只要是国家出版的,都是好书!

上级有了指示,鼓励青年自学成才。于是,工会组织所有的青工,率领大家学习英语,只要自学英语,就是有志青年。

晚上 8 点,会议室就响起英语的和声,坐在教室里的青工,正是激情荡漾的年龄,有对家的眉目传情,企图得到对方的响应。我的宿舍离会议室不远,我正想在写部反映深山小站的中篇小说。刚刚文学起步,心里想的写不出来,写出来了又觉得不合适。常常是一张稿纸,写上几行,觉得不好,撕掉重写。就这样写了撕,撕了写,地上扔了几十张废纸。

领导敲门,我开门。领导站在门口,吃惊地看着满地的废纸,问在干什么?我说写小说!领导说大家都在做有志青年,不带头参加,躲在宿舍写啥小说!有人都知道我写小说,想当作家。我成了人们的笑柄。我和大家一样是中专生,学习不是最好的,身体不是最好的,哪一方面都不出类拔萃,凭什么想当作家?

我们吃饭的时候,围着圆圈,蹲在地上,有工友问我听说你想当作家?我说咋啦?人家站起来,围着我转圈,像驴拉磨。我问看啥哩?人家说看你身上冒啥气哩。工作不忙的时,请假回趟老家,到你家先人的坟上看看,指着我长没长当作家的草!还有个人也站起来,指着我说,杜光辉,你要是能当上作家,你站在这里,我从你裤裆下边钻三圈!10 年后,我参加全国青年作家代表大会,回到单位,同学请我喝酒。那个说钻裤裆的工友说:光辉你要感谢我,当年要不是我的激将法,你哪有今天的文学成就!

为了攒钱买书,我几个月难得吃次肉,几年没添一件衣服。为了练笔,每天晚上写到凌晨两点。几年下来,整得面容枯槁,骨瘦如柴,两眼通红,头发蓬乱,走路不稳,衣服破烂。于是,人们不再称我的名字,男工称我杜作家,没有尊敬,全是揶揄;女工称我神经病,鄙视不屑。青年女工赌咒时,竟把我带进去;我要是怎么怎么了,就嫁给杜光辉!几个嫂子的女工,好心劝我,你不要把工资全买了书,要那么多书顶吃顶喝。把钱攒起来,买几身像样的衣服,看上哪个女娃了,就给人家献殷勤。也要在铁路上找个女婿,找个万源郊区的菜农也行,安家,生个娃,这辈子就算有了交代。一女工直接说,像他这种神经病,菜农都不要他!

党委书记从后门进来,从我手里拿去小说,说学完了,到我办公室来!

我没有反抗,毕竟有错在先。会议结束后,我到书记办公室,要我的书。书记说你上课看小说,说轻点是无组织无纪律,说重点是对组织的态度问题!我不说话,脑子里却閃出巴克的形象,摆出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他又说你先写份检查,检查深刻了,再把书拿回去。检查不深刻,再写,什么时候写深刻了,什么时候拿书。我说这书是借县文化馆的,归还到日

期了。书记说这个我不管,我只管你上课看小说是违犯纪律,必须严肃党的纪律!你说为什么上党课不认真听讲看小说?

我思考了一会儿,说我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国通史》,这些书全通读了,大学生的阅读量不一定有我的多。让我去听小学生上课,你说我能有兴趣?书记说我承认你读了不少书,但也不能不起工农干部,取长补短呀!我说我也想补,但他们最长最长的都比我最短最短的还要短得多,根本没办法补。让数学博士和小学生取长补短,咋补?你们要是懂三分之一,算我吹牛,给我任何处分都不喊冤枉!

第二次开会,我找当医生的老乡,开了张病假条,说是脑神经植物性功能失调。指导员看了病假条,不知道属于什么病,我就给他解释,这属于精神病的一种,处于初发期,要是严重起来,会防火跳楼自杀。我确实也像个神经病人,很长的头发,多日子不洗,蓬乱,穿着复员带回的旧军装,纽扣掉了,腰上勒根电线,要是边走边唱,再加上手舞足蹈,人们绝对认为是个疯子。

有了医生的神经病证明,指导员组织对我的批判,刚拉开场就熄灭了战火。

没过多久,我被调往毛坝关火车站。那里是单位的拘留所,只要不服从领导指挥,不积极给领导打蜂窝煤,不经常给领导送鸡蛋,就有可能发配到那里,人们把毛坝关称作犯官流放之地。毛坝关比万源的环境恶劣,车站设在半山,一半架在桥上,一天中除了两趟慢车,在这里停车三分钟。除此之外,寂寞入骨,人们恨不得对着山崖捅上几拳。山高皇帝远,远离领导,正是读书写作的好地方。单位规定,三个人一间宿舍。员工除了上班,剩下的时间喝酒打麻将,无法清静看书。两层楼的楼梯中间,有个堆放清洁工具的楼梯间,能支一张床,再支一张桌子,进门需要把凳子放到桌子上,进去后再放下凳子。我看了上这个楼梯间,用石灰刷了,当我的宿舍兼书房。桌子对面是个小窗户,一尺高,一尺半长。山里的房子顺山而修,一栋比一栋高,窗户外边是女工宿舍。

离开万源,就没有借书看杂志的地方。那时《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刊物,刚刚复刊,限量发行。每天一趟慢车,拖着邮政车,有邮政员在车厢里游动,出售杂志。我就在毛坝关上车,到车厢里找邮政员,买了杂志,到下一站的麻柳车站下车,再走回毛坝关车站。长度达十四五公里,经过三个上千米的隧道。

我揣着新买的杂志,沿着铁路朝回走去。隧道里充满食物霉烂的臭味,熏得人几乎窒息。走到隧道中间,眼前一片漆黑,感觉整座山都挤压在身上,像走进巨大的坟墓。道就是等距离的,步子不敢迈大,不能迈小,完全凭感觉一步步朝前走,稍不注意,一脚踏空,就摔倒在铁路上。铁路除了钢铁就是石子,没有一个软和东西,弄不好摔个鼻青脸肿,受伤流血。我全然顾不上这些,害怕失去了刚买的杂志,害怕脏污了杂志。过隧道时,最怕的是有火车通过。列车从身边通过时,我真正理解什么是雷霆万钧之势,什么是庞然大物。列车挤满整个隧道的空间,呼啸而过。这时,我首先要寻找庇护所。有时离底庇护洞,就紧紧地贴在洞壁上,看着火车几乎擦着鼻尖通过。车轮在钢轨上碾轧出璀璨的火花,四下飞溅,落在脚前。有一次,火车通过我身边时,覆盖车厢的篷布散开,竟然擦了下鼻尖,吓得我急忙爬下。火车通过后,我还艰难在隧道里,半天爬不起来。真愚呀,如果篷布再散开一点,我会被篷布卷到车轮下,碎骨万段。

上班攀山渡线,下班时间看书写作,成了主流生活。我的阅读向更深更广的范畴延伸,触及哲学、社会学,甚至绘画、建筑等方面。无数个午后,我阅读着中外名著。书籍把我带进欧洲文化兴起的第一浪潮,了解了古希腊、古罗马、残酷黑暗的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现实主义文艺;了解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第一个浪潮,春秋战国、隋唐时代、宋的纷乱、元的铁骑、明的治乱、清的腐败;了解了宇宙之浩瀚、原子之渺小;了解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内核、人的情感世界的微妙。

那些春夜微荡的暖风里,从书里走来了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德漠克里特、伊壁鸠鲁;夏夜的清凉山风,吹来了但丁、乔托、乔万尼·薄伽丘;秋夜清冷的光月里,我的面前坐着康德、歌德、黑格尔、海涅、席勒;冬夜的凛冽里,陪我苦熬的有马克思、恩格斯、雨果、罗曼·罗兰、大仲马、小仲马、莫泊桑、莎士比亚、托尔斯泰——他们给我娓娓而谈,剥去了眼前的雾霾,使我的视线穿越了人类上千年的历史隧道,看清人类如何艰难地走到今天;他们给我展示了人类文化的辉煌,把我托举到认知的高度,使我洞察到世界未来的认知,我们处所的灾难,警示同类避开同样的灾难;他们清理了我心智里的魔障,使我的思维透亮清新,抛离世俗的羁绊,享受属于自己的生活;他们教诲我做人的品德,真实、善良、博爱,关爱他人,同情怜悯。

我像久旱的沙漠,遇到春雨的滋润,一滴不露地吸收;也像有生以来都处在饥饿状态,猛然遇到丰盛大餐,拼命饕餮。那些年的阅读,为我的文学创作,为我以后上大学教学,奠定了非常厚实的基础。

那时候给杂志投稿,要求用 300 字的方格稿纸。毛坝关没有方格稿纸买,我就坐火车跑到陕西的紫阳县、四川的万源县,买方格稿纸。很艰难,即使买到,质量也很差,钢笔写在上面,洒。坐火车买稿纸,住宿费不能报销,就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遇到站务员盘问,掏出工作证,人家看我在同行的份上,莫泊桑在长条



上工

王锡儒 摄

椅上。

我对吃穿不讲究,就讲究写字的钢笔和纸张。稿纸要厚,要光滑,不能太白不能太暗,写字不能洒。买不到好稿纸,心不甘,到处找好稿纸,像饿狗寻食。一次到万源县城买稿纸,无意中走到万源县印刷厂门口,心里突然开窍,找到业务部门,提出印稿纸的想法。人家说我们有规定,300 块钱以上的业务才下单。我说我这几天给你们送来 300 块钱。当下,人家领我到库房,给我介绍了各种纸张的质量、用途、价格,帮我选了既实用又经济的纸张。300 元钱,确实不是一笔小数字。我一个月的工资四十二块多,过去的工资除了吃饭都买了书,基本没有存款。

我回到单位,向同学借,第二天就给印刷厂送去了 300 块钱,还送去了稿纸样本,要求印 150 元的 300 字稿纸,印 150 元的 400 字稿纸。为了区别这些稿纸是我个人掏钱印的,我在稿纸下方印上了“巴山隐人”四个字。

一个礼拜后,雇了两个山民,从印刷厂背回稿纸。回毛坝关的火车已经过去了,我只能在同学那里借宿。我们走进单位大楼时,刚好碰到技术室主任,看着背篓里的稿纸,问啥东西?我说稿纸。他问要这么多稿纸干啥?我说写作呀!他说你还想当作家?我说作家又不是反革命,为啥不能当。他没理我,走到背篓跟前,拿起一本稿纸,说质量不错。再没说啥,拿了五六本,说给我娃当作文本文真好!他这么一拿,几个机关干部都涌到背篓跟前,都拿。这也难怪,他们调到这里后,孩子也跟着到这里上学,好作业本都买不来。我哪能考虑到这些,这些稿纸是借钱印的,他们拿走了我用什么?我看越来越多的机关干部都朝背篓伸手,心痛得顾不上领导不领导了,猛地大声吼,住手,都把稿纸放回去!有几个还拿着稿纸,朝我笑,脸上露出巴结的谄媚。我冲到我眼前,一把夺过稿纸,放回背篓,说你们要用,掏钱到印刷厂印去,少拿我的稿纸!那些干部看着我,极不情愿地放下稿纸。数年后,我有了孩子,把孩子的教育看得至高无上,就理解了他们的舐犊之情,也后悔自己太不近人情。如果换到现在,绝对不会拒绝他们索要稿纸。

我用了上心仪的稿纸,却背负了 300 元钱的债务。债务关系着人的声誉,我成天想着如何尽快把钱还给人家,尽量节俭花费。我把自己的全部开支控制在 12 元以下,每个月拿出 30 元还债。

我退休了,自己做饭吃,这样省钱。我每天买一斤青菜,两个鸡蛋,一斤面条,酱油、醋、盐若干,肉类绝对远离。这样下来,每个月 12 元还能再节省一两元。一次上山查线,快下到山底了,突然感到一阵头昏,身子一软,眼前一黑,从山坡上滚下去。工友把我背到车站医疗室,驻站医生检查后,说我是长期营养不足,劳累过度所致。推了一针葡萄糖后,工友把我搀扶到楼梯间。我同学高继也在毛坝关火车站,赶忙让他老婆王秀荣给我煮了碗鸡蛋面条,还放了一个鸡腿。真香呀,我已经半年没闻过肉的味道了,吃过这碗鸡蛋面条,我的头不昏了,身上有了精神,又俯在桌子前边,写开小说。一直到今天,我都忘不了那碗鸡蛋面条。

我除了想当作家之外,更觉得面对这个世界,有很多话要说,有很多情感要宣泄,写作是说话和宣泄情感的一种方式。我从读到这样的文字:“在特定的环境中,人们还有一种最后的自由,就是选择自己的心态。”身处沙漠,干渴的你对最后半杯清水的时候,何尝何感想?是为只剩下半杯水而难过,还是为还有半杯水而开心。几乎每隔几天,我都能读到类似的文字。这些文字像黑暗中高举的火把,照亮着我的黯淡人生,使我一步一步坚持地朝着理想爬行。

我写的东西是不是小说,我自己都没有把握,通过同学认识了西安仪表厂的宋登,他发表过小说。毛坝关离西安火车得一天一夜,我利用探亲时间,跑到西安,把写好的小说拿给他看,请他指教。回到毛坝关,把写好的小说寄给他。几乎每邮给他一篇小说,他都要回信,告诉我这篇小说的长处和不足,如何修改。我至今还记篇《信里给我说的话:文学是个长期的磨炼,只有经得起磨炼的人,才能攀登到文学的顶峰。我在他那里,知道了什么是无私,什么是诲人不倦。

在毛坝关写作,使我理解了作家的孤独,不仅仅是一个人在楼梯间的屋子里,不和其他人交往,日日、月月、年年,独自看书写作。更使人感到的是精神的孤独,心灵的孤独。读的书越多,发现的黑暗越多,越想揭示这些黑暗,越想高举火把,驱散黑暗。但是,得到的大都是嘲刺、不解、攻击、批判。我不知道,我能将这支火把高举多久,能不能坚持下去?我会不会像同事一样,买些鸡蛋,买只母鸡,坐火车送给领导,用这种方法靠拢组织,离开毛坝关,得到提拔。但是,事情的书里,没有一个作者教我去做这样的事情。书,让我的脊梁变得坚挺了。多少个不眠的深夜,我看书累了,写作累了,走出楼梯间,走到充当站台的桥梁上,望着四周黑乎乎的山,面目狰狞地看着我。头顶上巴掌大的星空,月光照着这个小火车站,撒下清冷的光。人生的前途在哪里,写作的前途在哪里,我一无所知,满目茫然。很多时候,真想一头撞向山壁,朝桥下纵身一跳,一了百了。

但是,人世间的友谊和欣赏,拯救了我。当时段长赵铭昌,是兰州铁道学院的毕业生。他每次到毛坝关检查工作,吃过晚饭,就和我坐在山坡上,谈论历史,谈论哲学,谈论文学,谈论人类,谈论宇宙,常常谈到东方破晓,山崖下的农舍里,发出公鸡的长鸣,还不尽兴。我们谈论更多的是那个美丽到极点,我们含着眼泪,视线朦胧地看着漆黑的大山,迷惑地思考。

赵铭昌给我说,你读了那么多的书,受了那么多的罪,一个作家该具备的你都具备了。你必须坚持下去,天道酬勤,绝不是一句空话!他一次一次和我促膝长谈,每和他长谈一次,精神和心灵就振奋一次,活下去的决心就坚定一次,看书写作就更勤奋。一部一部名著读完,一篇一篇习作寄出去,飞往大巴山外的文学编辑部。他还不止一次地给我说:这是一个以言定罪的社会,你一句无意的话,很可能成为人家给你定罪的把柄。爱好读书,对不爱读书的领导来说,就是叛逆,任何领导都不喜欢叛逆的人。

我做梦都没想到,1983 年那场严打,竟把我列入严打对象名单。理由是目无组织,目无领导,骄傲自满,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严重,读不健康书籍,扬言要当作家等等。把我定为严打对象时,领导层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赵铭昌坚持认为,杜光辉是好青年,是有理想有志气的有为青年,应该树立为榜样!安康铁路公安分局的马士琦、安康铁路分局政治部的席透,他们拿着我的材料,专门回到分局,给担任分局严打领导小组组长的蔡礼丰汇报。蔡礼丰是铁道兵的政委,转业到我们分局当副书记。他觉得我可能是不可多得的先进典型,更是破除极左思想的典型。他指示马士琦和席透,对我进行调查。马士琦和蔡礼丰到毛坝关,看了我写作睡觉的楼梯间;看了床上箱子上桌子上堆满的书籍;看了一大堆习作;看了被老鼠咬了一半,我还要吃的馒头;看了我穿的破烂衣服;看我面黄菜色,枯瘦无比;听了毛坝关铁路员工对我的反映,感动地流着眼泪说,光辉,你真不容易。我们只是听说你过得艰难,写得艰难,没想到这么艰难,简直超出我们的想象。

他们又向蔡礼丰做了汇报。蔡礼丰在全分局干部大会上,点名表扬我,也批评了我们单位的领导,这么优秀的青年工人,不打牌,不酗酒,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看书写作上。我们的领导,不鼓励不表扬,还压制打击,竟然列为严打对象——

蔡礼丰刚把我表扬过,河南的《奔流》杂志发表了我的小说处女作,这在当时的西安铁路局是很少见的。

3 个月以后,有个叫李康平的文友干上了宣传部的领导,把我提拔到分局宣传部担任文化创作员,命运发生了彻底改变。我感谢马士琦、席透,感谢蔡礼丰、李康平,如果不是他们,我现在可能是劳改释放犯,绝对不会成为一级作家。

感谢 35 年前的生活,它为我积淀了丰厚的生活素材,使我创作了众多关于山区铁路工人的小说。还使我认识到,当你处于逆境时,只有自己能拯救自己,只有自己能以毁灭自己。数年之后,我读到弗兰克的话:“要让你们的生命产生价值,只有你们自己!”竟然感慨得流出眼泪。